

吉林人民出版社

梁启超与胡适

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

董德福 著



梁启超与胡适

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

董德福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HI LIANGQICHAOYUHUIS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董德福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
ISBN 7-206-04308-9

I. 梁… II. 董…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思想评论
②胡适(1891~1962)—思想评论 IV. ①B259.1 ②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9771 号

梁启超与胡适

——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

著 者:董德福

责任编辑:谷艳秋

封面设计:翁立涛

责任校对:阎 勇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网址:www.jlpph.com 电话:0431-564971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82547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电话:0431-5637018

印 刷:长春市东新印刷厂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26 字数:38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308-9/K·139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 000 册

定 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董德福同志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部书稿即将出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4年前，德福问学于我，当他以“梁启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相征询时，我先是觉得这一课题难度很大，没有长时间的资料准备和相当高的研究功力，恐不易做好。这是因为，梁胡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学问博杂，学问欲与政治欲都很炽热，与国共两党积怨甚深，在棍子、帽子满天飞的时代，这两位大学者都成了批判的对象，长期未能给予深入的研究和恰当的评价。改革开放后，在摆脱了极“左”的思想束缚和僵化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之后，实事求是地评价梁启超和胡适成为可能。青年学子纷纷以梁启超或胡适作为研究课题，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和论著。由于时代发展程度的落差，梁胡研究在台湾日渐降温的时候，大陆的梁胡研究（特别是胡适研究）几成显学。有学人慨叹：已到了无题可做的地步。这表明，这门学问已相当成熟，再要做出新的成绩，确实是很困难的。我后来之所以同意该博士论文选题，主要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深知他乐于学习，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勇于探索，而且研究梁启超和胡适已有七八年的时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研究资料，颇有一些研究心得，具备了完成该论文的条件。加之学术界迄今将梁启超与胡适作深入、全面的比较研究的成果甚少，而这一

课题如能做好，不仅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而且可以进一步加深和拓展梁启超和胡适研究，对深化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也很有意义。

梁启超（1873 - 1929）早年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通过日文资料接触大量西方文化，思想脑质为之一变。在日本期间，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报刊，提倡“新民”学说，思想日趋激进，他那“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对青年学子别具魔力，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这些崛起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无不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20 世纪初年，梁启超用新的观念和方法撰写中国学术史，提倡史界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成为开时代风气的启蒙大师。1912 年梁启超归国后，政治欲望膨胀，从事“贤人政治”，有功有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以私人身份游历劫后欧洲，后思想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开始对欧洲科学文明进行反省，转而提倡东方精神文明。梁启超在欧洲期间，曾亲历巴黎和会，游说诸方外交名流，为中国力争权利，把不利于中国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发到国内，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梁启超一生思想屡变，多有反复。早年热心介绍西学，晚年竭力复兴儒学，倡导东方价值观；一度依靠袁世凯搞宪政，后又反对袁世凯称帝，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先是紧跟康有为，后又背叛师说，标新立异……。这一切颇遭时人及后人的非议。但有反复之小人，也有反复之君子，梁的“善变”、“多变”属于后者。解读他的文字和行为，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有一个爱国的情结贯串其间，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身后不被研究者和国共两党所重视，令人费解。直到近年，这一窘况才有所改观。

胡适（1891 - 1962）小梁启超 18 岁，整整相差一代，思想观念、研究方法、知识结构也相差一代，他正是在梁启超启蒙思想的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一般认为，

胡适思想是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背景的，这种认识有其合理性，但不能说是全面的。事实上，要了解胡适所领导的白话文学运动，不能不了解梁启超的新文体和晚清白话文这些语言背景；要懂得胡适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不能不提及梁启超 1902 年所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所起的引导作用；要理解胡适的诸子学研究及其在五四思想革命中的突出贡献，不能不考虑梁启超和章太炎等前辈学者重视诸子学价值的初倡之功。与梁启超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不同，胡适一生追求科学方法、民主政治，提倡思想自由，以民族反省和自责主义谋求中国文化的出路，少有变化。但胡适的思想行为中也存在着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理智上倾向于西方文明，生活行为上又无可奈何地回归东方文明。他一生反共，无需多议，与国民党的关系则十分复杂，有亲近的一面，愿做国民党的“诤友”，也有恨铁不成钢的一面，甚至对国民党有过严厉的批评。他相信，只有国民党能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现代化之路，但当国民党的政策背叛五四新思想时，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捍卫五四精神，与国民党的封建专制作坚决的斗争。胡适是一个别样的爱国主义者，对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及其他保守主义者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批评毫不留情，以至于长期以来在海峡两岸均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胡适的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失败，决定了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本书的作者董德福经过 3 年的刻苦钻研，勤奋写作，终于如期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受到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后他又用一年的时间进行修改。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分量是沉甸甸的。通读全稿，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突破常见，大胆创新。全书共分八个部分，有统有分，有张有弛，论述中充分运用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提出了不少创新的观点，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学术专著，读后有耳目一新之感。如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学思潮起始于五四时期对新文化运动的反省，梁漱溟

乃这一思潮的初创者，本书与这一看法不同，提出晚年梁启超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开创者，他以人文自觉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误导，主张以中国精神文明医治世人精神苦痛，在五四反孔大潮中为儒学精神作辩护，在许多方面为后来的新儒家学者作了观念上的最初定位，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不失为一家之言。又如作者不同意长期以来视胡适为全盘西化派的定论，指出要同情地了解胡适西化言论的特殊语境，判断一个人的文化立场，不仅要看他说了一些什么，还要看他是怎么说和为什么要这样说，更要看他做了一些什么，否则观察会流于表面、肤浅。再如学术界普遍认为，梁启超倡“新民说”时期倾向于西方价值，思想一度很激进，但后来倒向开明专制，与革命党死战；民国后又联合封建势力，主张立宪共和，反对国民党的革命共和；五四期间思想越来越保守，提倡复兴东方文明，对西化道路多有反省，被“新青年”无情地抛在了后面。本书认为梁启超思想十分复杂，不能作如上的简单化处理。梁虽与革命党展开论争，但由于革命党相对忽视启蒙宣传，梁启超的早期启蒙思想间接地有功于辛亥革命，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驱，这是很可靠的一个判断。到了五四时代，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早期革新派，一个个都保守落伍了，甚至成了新思潮的对立面，而梁启超虽在文化价值观方面不尽同于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学者，但他洞察时势，以不惜向昨日之我开战的勇气，紧跟时代步伐，支持白话文运动，创办介绍新思想的杂志，邀请国外名流学者来华讲学，对科学、民主、自由等给予基本的肯定。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批评者，但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敌对者。如此等等，新见迭出。

第二，资料翔实，引证合理。梁启超与胡适都是高产作家，分别留下了一千多万字和二千多万字的文字材料，仅《饮冰室合集》就有148卷，胡适更是有许多日记、书信、手稿存世，耿云志先生1994年编辑出版了一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共42册，累在一起足有数尺之高，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我觉得，是否在研

究中引用这些日记、书信，特别是《遗稿》中的材料，应是衡量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价值的一个指标。这些材料仅通读一遍就十分费时，再要从中精选并加以合理使用，确实不易。再加上几十年来，海内外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既要熟悉这些成果，了解学术前沿动态，还要能驾轻就熟地运用这些成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从本书所列主要参考文献可以看出，作者至少参考了梁启超和胡适的著作（含他人选编文集）、后人研究梁启超和胡适的著作及单篇论文等共计近300种。这些参考文献并不是列出来给人看的，而是实实在在地加以参考引用，很好地帮助作者阐发自己的观点。作为一个青年学者，能有这样一种实证的精神和驾驭材料的能力，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史论结合，哲理深刻。作者在本书“后记”中指出，1982年，蔡尚思先生在接受张德旺采访时表示：“我主张从历史上搞胡适研究一定要努力学哲学，然后才能对历史做出真正科学的评价，能分析明白胡适及与他相关的各种事件、人物。如果单纯学历史，不搞哲学，那对胡适的历史研究一定搞不好。”我比较赞成蔡先生这一见解。董德福同志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以哲学和中国哲学为自己的专业，后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又改习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这种跨专业的学术经历，对他完成博士论文大有裨益。兼攻哲学与史学的特长，在他这本书稿中得到了很明显的反映。作者从中西文化交流对话、各种文化价值观相互激荡的广阔背景着眼，通过对梁启超与胡适思想学术的全方位比较，揭示时代演变的痕迹和学术发展的规律，有史有论，史论结合，不乏哲理的深度。

当然，本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梁启超和胡适在许多学科领域都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本书作为一部全面比较两人学术思想的专著，似有所遗漏。例如，梁启超与胡适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哲学思想、民主政治观念等都值得作比较研究。希望董德福同志再接再厉，进一步开拓，在梁启超和胡适研究方面再做贡献。

蔡少卿

2003 年 6 月 8 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导 言 过渡时代开风气的启蒙大师·····	1
一、两个“分水岭”：过渡时代 的前端与后端·····	1
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3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	27
第一章 学术思想背景探源·····	33
一、早年教育和家庭社会环境的异同···	34
二、清代学术思想的历史演变·····	58
三、现代化初始阶段的历史三步曲·····	64
第二章 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迎拒·····	74
一、思想学术上的领路人·····	75
二、学术友谊的建立·····	84
三、对研究系的戒心·····	88
四、胡适眼中的梁启超·····	94
五、时代递嬗中的思想接力·····	105
第三章 频繁的学术交往·····	114
一、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辩难·····	115
二、“墨学”之商榷·····	132
三、两份“国学书目”的对垒·····	145

目 录

四、白话诗的意见分歧·····	159
五、对科学的辩护与限制·····	174
六、论批评是学术进步之道·····	188
第四章 中西文化观的对立互补·····	194
一、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解说·····	195
二、儒学的复兴与解构：两种 儒学观·····	207
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234
四、“充分的世界化”背后的中国 情结·····	249
第五章 整理国故的理论与实践·····	259
一、整理国故的动因与目的·····	260
二、整理国故的原则与方法·····	268
三、整理国故的实践与成就·····	274
四、整理国故的特点与评价·····	280
五、整理国故的影响与评价·····	290
六、整理国故的一个实例：清学研究 两巨峰·····	301

目 录

第六章 时代变迁的痕迹：从“新民子”到“新青年”	317
一、从团体自由到个体自由	319
二、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处理	329
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	334
第七章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梁启超与胡适	345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驱	346
二、中国文艺复兴之父	359
三、过渡时代学术与政治的两歧性	375
主要参考文献	389
后 记	402

导 言

过渡时代开风气的启蒙大师

昔龚定庵有言：但开风气不为师，吾夙以其有妙谛而服膺之。

——梁启超：《同学欢迎会演说辞》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胡适题章士钊词

一、两个“分水岭”：过渡时代的前端与后端

从“戊戌”到“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就思想文化层面而言，即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瓦解，让位于新型思想文化的时期。具体地说，从1894年甲午海战到1923年科玄论战这30年，可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过渡时代”。如果说梁启超思想属于这过渡时代的前端，则胡适思想则属于这过渡时代的后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中国学术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真正开始，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它具有了相当

多的现代性质素，但还带有明显的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痕迹，是旧的将破未破、新的将立未立的变革骤起的时代，处于过渡时代的前端。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是一项包含着纵向逐步展开和横向渐次拓展过程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维新变法思潮及随后由梁启超主创的“新民”思想，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奏，而辛亥革命是试图建立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但革命成功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并没有彻底葬送封建传统，帝制的死灰复燃和定孔教为国教的叫嚣声，唤醒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文化反省与文化批判的明确意识，1917年初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道出了压积在中国人心中的全面现代化的心声。自此，过渡时代渐趋末端。

梁启超是上述过渡时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他的思想不求深，但求新；不求玄虚，但求致用；不求永恒，但求时效。他曾留下如下的诗句：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①

为了达到开时代新运的目的，梁启超不惜遭人误解乃至攻击，挥动着他那支健笔，书写“起民权移旧俗”的华丽篇章。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牢牢地掌握、指挥着新闻舆论，专向启蒙宣传方面用力，收效至巨。20世纪初年，中国封建主义思想业已腐朽，近代民主自由意识破土欲出，而中国文化及意识领域仍被千百年来的旧传统所禁锢。时代需要冲破旧的传统，注入新的生机，梁启超没有辜负时代的要求，他力倡“新民说”，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极力鼓吹革命破坏，向往民主共和。他在全面介绍西方启蒙思想家学说的同时，又以大无畏的精神倡

① 梁启超：《自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以下简称“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6页。

导文学革命、诗歌革命、戏剧革新、史学革命，又提出道德革命，反对蒙昧奴性，提倡解放思想，倡导解放妇女等等，使社会伦理及文化思想掀起革命风潮，在这一风潮中，数十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形成了我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我们完全有根据说，《新民丛报》是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划时代的刊物，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均从这个刊物获得许多灵感。

美国学者张灏认为，梁启超比五四新青年更早促进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化，梁塑造的一代“新民”，与现代中国之间的联系，要比五四“新青年”更具代表性。“梁的思想发展可被看做是儒家经世致用这一古老传统和寻求现代思想新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纽带。”张灏还指出：

梁启超的国民理想看来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念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是一位关键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①

几十年来，中外研究者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可谓见仁见智，歧见杂出。与张灏的观察不同，相当多的人更倾向于强调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转变过程中的地位，认为胡适是现代中国一位路标性的人物。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胡适在专业领域并没有超卓的贡献，甚至在一些方面的造诣，还不如他的

^① [美]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8页。

学生傅斯年、顾颉刚辈。然而，胡适的贡献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专业，从主张文学改良、倡导民主自由，到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整理国故、中西文化的讨论，胡适的初创之功是不能抹杀的，后来的人对他的思想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无不以他所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特别是他所提倡的白话文学运动和所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更是将中国历史和中国学术划分为两个时代。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在《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贡献》一文中说，五四期间，胡适提倡并身体力行用白话写新诗，宣称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从而把文言文从正统的高位上拉了下来，白话文和文言文翻了个筋斗。从此，“白话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这件事在中国文化、思想、学术、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都有绝大的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就某些方面看来，也可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①

综合以上两种说法，我们可以认为，20 世纪头 20 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发展有两个“分水岭”，这虽不免有研究者分别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拔高性评价之嫌，不过与历史事实是大体相符的。鲁迅曾指出，由于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倡导和发生，从而改变了“无声的中国”。梁启超叱咤风云的时代处于第一个“分水岭”，而胡适的出现及其在中国思想界呼风唤雨式的表现，则代表了第二个“分水岭”。从“文化”与“史”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的舞台由梁启超草创，而序幕是胡适拉开的。1917 年发轫的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文化结构全面更新的肇始，在这场绚烂壮丽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即是首举义旗、冲锋陷阵的“急先锋”。没有人可以绕过梁启超和胡适谈论近代中国，要了解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更不得不提及他们的思想学术活动及其影响。梁启超与胡适都是开时代风气者，对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由传统向现代转进，作出了筚路蓝缕的开创性贡献。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梁胡分别以独立于权威和忠于自己的信仰的姿态，出现于

^① 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3 页。

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认真地履行着知识分子应有的历史责任，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深深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甚至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梁胡都自称喜爱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并以此为座右铭。但实际上只是谦词，他们是既开风气又为师的，他们能挤身“国学大师”的行列，绝非偶然。

梁启超是一个学问家、思想家、宣传家、政治理论家，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现代学术的奠基和现代思想的倡导上。梁启超认为现代学术的基本精神是“自由”。这也是他摆脱旧经学传统的根本所在。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他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术界盛产伟人，要即在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及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自由遭到两度箝制，从此中国学术遂一蹶不振。针对这一历史教训，梁启超大力倡导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他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表示：“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自注：欧洲之兴全在此）……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辕北辙也。先生所示自由服从之义，弟子以为行事当兼二者，而思想惟有自由耳。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①思想是否自由，是学术能否独立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所在。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以过来人的身份，特别强调了此次思想大转折的意义：“此诸论者，虽专为一问题而发，然启超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途径，皆略见焉。”^②他还进一步揭示中国思想之痼疾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在没有独立性。以清儒论，颜元的思想近于墨子，而必自称出自孔子；戴震的学术近于西洋思想，而必自称出自孔子；康有为大同说，空前创获，而必自称出自孔子，这些都是“好依傍”与“名实混淆”的典型，此病根不除，中国思想、中国学术终无独立自由之望。梁启超以是否“自由”来区分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7-278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80页。